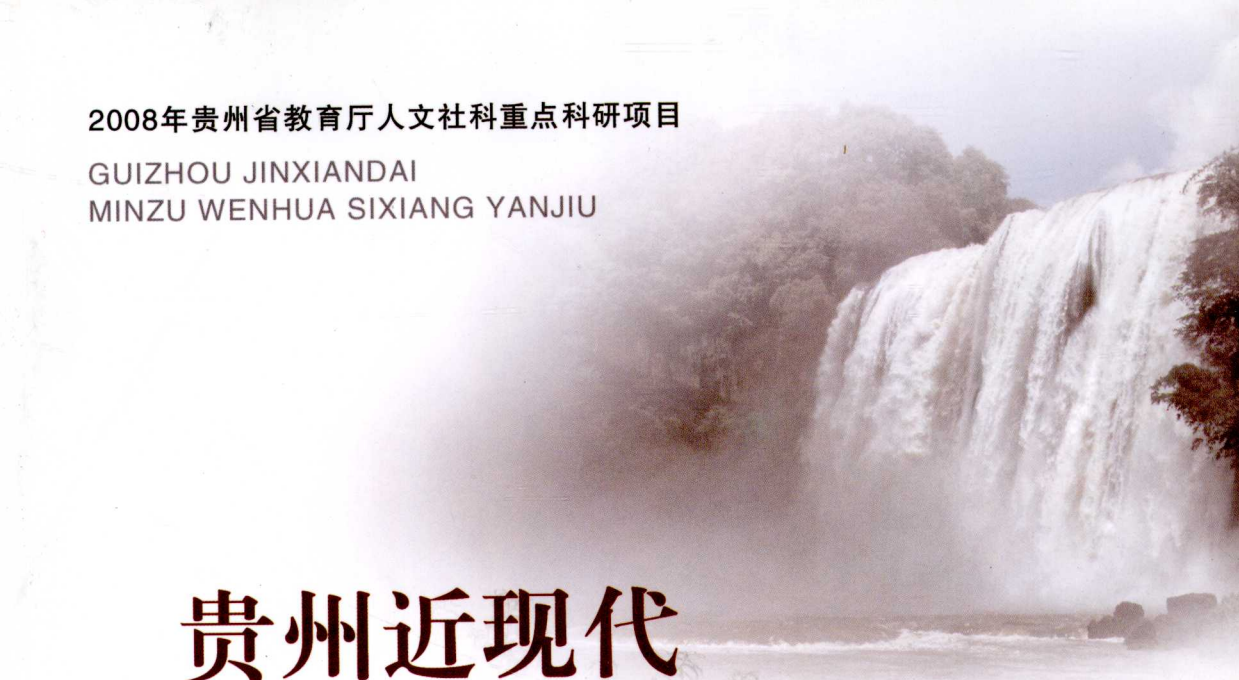


2008年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科研项目

GUIZHOU JINXIANDAI

MINZU WENHUA SIXIANG YANJIU



贵州近现代 民族文化思想研究

◎ 田永国 罗中玺 赵 斌 / 著

0.73

5

出版社
TY PRESS

01496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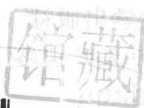
2008 年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科研项目

贵州近现代民族 文化思想研究

田永国 罗中玺 赵 斌 / 著



淮明师院图书馆 1496897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学术专著 青视双湖

为书券赠册订装并赠出学大其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近现代民族文化思想研究 / 田永国, 罗中玺,
赵斌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308-10177-6

I. ①贵… II. ①田…②罗…③赵… III. ①少数民
族—民族文化—文化思想—研究—贵州省—近现代 IV.
①K28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1594 号

贵州近现代民族文化思想研究

田永国 罗中玺 赵斌 著

责任编辑 周卫群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良渚印刷厂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1.75

字数 224 千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0177-6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上 编

第一章 绪论:近现代民族文化思想的碰撞与交融	3
第二章 古老悠远的民族历史	9
第一节 百濮族系	9
第二节 氏羌族系	12
第三节 南蛮族系	14
第四节 百越族系	20
第五节 华夏族系	23
第三章 民族文化思想的特殊生境	25
第一节 山高谷深的自然生境	25
第二节 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生境	27
第三节 错综复杂的民族生境	30
第四节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境	35
第四章 薪火相传的民族文化思想	40
第一节 村规民约——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延续性、强制性	40
第二节 民俗习惯——自然传承的潜移默化	43
第三节 宗教与禁忌——底层心理束缚性传承	46
第四节 民间社会组织与文化职司——民族文化遗产的结点	48
第五节 民族文化传播理论与贵州近现代文化传承模式	51

下 编

第五章 民居建筑文化思想	57
第一节 民居建筑的主要类型	57
第二节 民居建筑中的哲学思想	62
第六章 家族村落文化思想	68
第一节 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化	68
第二节 家族文化的典范	76
第三节 少数民族的村落文化	85
第七章 民间文化艺术思想	94
第一节 民间文艺的审美意识	94
第二节 民间戏剧的宗教信仰	103
第八章 节日婚丧礼俗文化思想	113
第一节 节日文化中的祭祀与交往	113
第二节 婚姻习俗中的生殖崇拜	117
第三节 民族丧俗中的生命崇拜	120
第九章 民族服饰文化思想	130
第一节 绚烂多彩的民族服饰	130
第二节 叙事、记忆和传承的历史文化特征	134
第三节 “万物有灵”的宗教文化特征	136
第四节 人生轨迹的文化符号	139
第五节 服饰的工艺文化特征	143
第十章 宗教文化思想	146
第一节 落后的社会生产与自然宗教	146
第二节 儒、释、道合流与民间宗教	154
第三节 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传播与贵州教案	160

第十一章 贵州民族文化与资本化运营·····	170
第一节 贵州民族文化资本化基本理念·····	170
第二节 贵州民族文化资源·····	174
第三节 贵州民族资本化运营实践研究·····	179
后记·····	182

上 编

第一章 绪论：近现代民族文化思想的碰撞与交融

贵州近现代民族文化思想研究

贵州近现代民族文化思想,是一种区域性、时段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是贵州各民族文化思想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反映。从空间上来说,它是指贵州行政区域演变范围内各民族人民在长期改造自然和自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物质与非物质的两种思想意识形态,是贵州各民族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与积淀,是人们对自然界、社会 and 生命的理性的思考。从时间上来说,它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延续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贵州近现代民族文化思想既有浓郁的南方各民族文化生活的文化气息,又有厚重的中原文化物质和文化理念,是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冲撞和融合的结果。

一、贵州民族文化思想的构成

贵州文化如果以特性来划分,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首先是以傩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先秦文化,其次是以牂牁文化命名的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性文化,然后是产生于农耕文化时期、成熟完善于贵州夜郎时期的竹文化,最后是唐宋明清时代传入贵州的中国古汉文化。如果以进入的先后顺序来分,贵州文化则可分为原生文化、古濮文化、三苗九黎文化、古汉文化、现代汉文化五个部分。贵州的原生文化主要保存在以仡佬为代表的贵州原住民族中,古濮文化主要保存在以布依族为代表的濮人后裔中,三苗九黎文化则主要保存在以苗族为代表的战争迁入民族中,古汉文化的典型代表有屯堡文化和穿青文化,现代汉文化则在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随战争及建设迁入。所以,贵州民族历史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是由多种民族文化凝结而成,它既包含着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岭南文化的遗传因子,又有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的内容。它既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与美学的渊薮,又在日常生活中,从不同的角度,以其独有的内涵,展示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文化心理素质、伦理道德和审美意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建筑文化中的“自然人化”思想;宗教文化中万物有灵的生态文化心理;节日婚丧习俗文化中的生命崇拜;民族服饰文化中的族群意识以及民间戏剧文化中的神巫

文化思想;等等。由于贵州地处西南偏隅,山高谷深,道路崎岖,江河水道不畅,自古以来,一直远离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尽管在清代“改土归流”之后,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极大影响,但许多如上所述的原初形态的文化思想意识依然被承袭了下来,生动地体现了贵州各民族人民对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人生境界原始的拷问和追寻,以及对生命诗境、人格理想的原始建构,具有原始古朴、自然天成的审美特征。

二、近现代外来文化对贵州文化的冲击

贵州最早的居民主要是“濮僚”,曾在古代贵州高原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夜郎文化。夜郎文化四周有巴文化、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不少研究夜郎文化的学者认为,夜郎文化受着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滇文化的直接影响,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发展的。然而研究巴蜀文化、滇文化、荆文化的学者,至今还未见这些地域文化是否受过夜郎文化影响的报道,这至少说明夜郎文化对它们的影响是很微弱的。

秦汉以降,川、湖、两广、云南相继开发,种种历史原因使贵州濮僚渐次衰落,氏羌东进,苗瑶西移,百越由南而北推进,而汉人则由北而南进入贵州,相互交流,互为穿插,彼此错杂而居,遂使贵州成为氏羌、百越、苗瑶和濮僚四大族系的结合点,同时又是汉族移民较多的地区。由于封建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拓,在贵州高原设置郡县,官吏的派遣、大量的移民、民族的迁徙、商业贸易的发展,等等,使贵州高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促使了贵州高原经济文化的发展。如秦汉时期,古代越人的稻作文化,就大量向贵州高原拓展。越人在历史上擅长舟楫,不断顺着江河水域,向贵州迁徙,成为今天侗族的先民。侗族先民进入贵州高原后,稻作文化亦随之传入贵州。

汉族大量向贵州高原迁移,使中原文化不断向贵州境内传播,对贵州地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族向贵州的迁移始于战国直至近现代。汉族人民迁徙贵州,必然将中原的先进文化传播到贵州。这种文化的传播直到近代依然如此。以教育为例,抗日战争时期,从外省先后迁来了浙江大学、唐山工学院、湘雅医学院、大夏大学、陆军大学、桂林师院等高等学校,一大批文化名人云集贵州,对贵州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所以,从历史来看,贵州是以文化输入为主,是由多种民族文化交融凝结而成的,既有汉文化又不纯粹是汉文化,既有少数民族文化又不是单一的某种文化。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用鸦片加大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

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与此同时，先进的西方科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居高临下之势，裹挟着硝烟血火，与中国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不断促进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向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演变。在两种文化的尖锐冲突下，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从内容到结构、模式、风格的变化，而进入了近代化进程的轨道。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首先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通过技术层面的反省和对西方强国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认真研究，提出中国要摆脱任人宰割的状况，必须向西方学习，“师敌长技以制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战略思想，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帷幕。之后，在19世纪60年代以“中体西用”为特征的“洋务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中国文化思想的近代化浪潮已破闸而涌，不可逆转。

贵州地处西南边疆，西方近现代工业文明对其直接冲击似乎不太大，但随着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日益腐朽和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潜滋暗长，近现代中西文化思想的激烈冲撞，改革派、洋务派、维新派、民主革命派的思想观点对贵州文化意识形态都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尤以严修、李端棻、张之洞等人的影响较大。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直隶天津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补国史馆协修。1894到1897年，严修奉命担任贵州学政。在贵州期间，严修关心民生疾苦，改革传统教育，积极倡导新学，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打破了贵州社会的封闭与落后，为贵州传统文化迈向现代文化立下了开创之功，同时，也为贵州近代文化思想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

李端棻(1833—1907)，字必园，贵州贵筑县(今贵阳)人。由同治二年(186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为御史，同治十年(1871)，出督云南学政，后历任广东、四川、山东乡试主考，全国会试副总裁，刑部、工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流放到新疆，1901年赦归故里，1904年开始复銜。李端棻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他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了“一经五纬”的改革纲领。他认为人才关系国家之强弱，激励人才是当务之急，应从中央到地方创设新式学堂，引进新思想、新知识，“以此为经”。“五纬”是指设藏书楼(即图书馆)、广立报馆(出版报刊)、选派游历者(派人出国留学、考察)。他的这些主张为光绪皇帝采纳，成为政府决策。变法失败后，李端棻受贬辗转回到贵州家乡，他在贵阳经世学堂及私宅中聚徒讲授，大力向学生传播西方民权和自由思想。并于1902年，发起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在李端棻等维新人士的影响下，贵州学界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者日渐增

^① 《筹议海防则》，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

多。社会上人们争阅新书、西书,到处听维新变法讲座,涌动着变法改良的思潮。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抱冰老人。清末著名的封疆大吏,洋务派首领。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1863年(同治二年)进士。历任湖北、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两江、湖广总督。张之洞幼年随父在贵州生活和学习,对贵州的山川风物、民风习俗应该怀有特殊的感情,然由于贵州咸同农民起义,使其父张鎡(时任兴义知府)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心衰力竭而病亡,加上其妻兄石均(都匀代理知府)被义军捕杀,其姐夫之父鹿丕宗(都匀前知府)自焚,张之洞一生对农民起义有着切肤之恨,也很少提及贵州,甚至“耻为贵州籍”。但尽管如此,张之洞入仕之后,还是经常关注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支持和帮助贵州对旧式书院的改革。在其担任湖广总督期间,要求贵州选派学生到湖北学习经史、时务、算学诸科,学成后回贵州任教,以改变贵州教育的落后现状。为“念先人旧治地”,张之洞在贵州推广“新教育”期间,向兴义府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捐赠银两、教材、实验仪器和教学标本等,为清末民初的贵州发展新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总体来看,近代文化思想传入贵州比其他地区晚得多,但在严修、李端棻、张之洞等人的推动下,落后的贵州逐步跟上时代的步伐。大批通过贵州官书局或邮传购运进来的新书、新报,在贵州知识阶层中掀起了一股法西方文化,改造和充实中国固有文化的热潮,使贵州以儒学为思想言行规范的传统文化点染上近代文化的色彩。这种点染,虽一时难以改变贵州文化的本色,但却成了连接时代的脉络。在贵州文化的长河中,“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成了贵州先进知识分子向封建专制开火的武器。1898年5月,贵州近代第一个向传统习俗挑战的“贵州不缠足会”全省性组织成立。之后,贵州出现了一批具有维新思想乃至革命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如雷廷珍在贵阳创办“黔学会”,宣传维新变法;吴嘉瑞在黔西南贞丰地区创办“仁学会”,研究谭嗣同的“仁学”思想等。1904年之后,一批具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性质的组织如“科学会”、“历史研究会”、“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少年贵州会”等纷纷成立。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918年11月成立的“少年贵州会”。它是五四时期贵州最大的爱国群众团体,它宣传科学与民主,主张用进化论改良的办法使贵州和中国由“老大”至“少年”。其组织最初以“具牺牲小己之观念,明合群救国之大义,增进学识,崇尚气节,锻炼身体,嫻游艺术”,“以造成少年贵州”进而造成“少年中国”^①为宗旨。1919年8月1日,改宗旨为“民族自动自决的庶民主义”^②。这是少年贵州会吸收了各种社会思潮和学术流派的影响,却又难以消化才提出的一个模糊概念。它包含着追求民族

① 《少年贵州会简章》,《铎报》1918年11月4日。

② 《本报改进之宣言》,《少年贵州会一览》第一年度,文牍。

平等、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宰割瓜分;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反对封建专制;承认五四运动中群众运动“自觉自动自谋自决”的进步性;又把俄国十月革命理解为“庶民主义”和民主的胜利等进步的内容。但它并不能分清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知道反帝反封建必须结合起来,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必须同反对本省的军阀统治结合起来的道理,这是它宗旨中致命的缺陷。这就导致它在五四爱国运动高潮退去之后,逐渐沦为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丧失了原有的先进性。“少年贵州会”曾一度走在时代之前,在同时期国内的社团中也是很突出的。它的思想理论,集中反映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期贵州思想文化上的活跃和杂乱,是近代以来外来文化对贵州文化冲击影响的展示。^①

也正是在1904年至五四前后时期,贵州的报纸出现了。如1907年,周素园创办了省内第一张日报《黔报》;1909年,张百麟等人主办了《西南日报》等。在五四运动前后,又有《贵州公报》、《贵州政报》、《铎报》、《勤报》等竞相出版。这些报纸成为近现代文化在贵州发展的一个标志,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贵州思想文化的进步。

在贵州近现代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外国传教士亦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从16世纪开始,洋教就已开始渗入贵州。明万历三年(1575),贵州被划为澳门教区。道光二十六年(1846),罗马教皇宣布贵州为独立传教区,次年派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白斯德望进入贵州传教,继后以胡缚理任贵州教区主教,利用中国赔款的5万法郎,在贵州各地修建天主堂、修道院、医院及学校。应该肯定的是,最先进入贵州的那些传教士们对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发展起到了“桥梁”作用。他们一方面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在翻译、出版中国文化,在中国兴办新式医院及新式学校的各个领域,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然到了鸦片战争后,在《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教会和外国传教士以征服者的姿态自居,藐视官府,欺压百姓,霸占田土,唆使不良分子挑起事端,从而激起了贵州人民一连串的“反洋教”斗争,先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青岩、开州和遵义等十多次教案。在其影响下出现了四川的酉阳教案和安徽的安庆教案等。虽然“贵州教案”终因清政府的无能而遭查办,但它反映出贵州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已开始觉醒,在反洋教斗争中增强了国家意识、中华民族意识,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从一个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变化中,增添众多的推动力。

三、本课题研究的重点

近现代外来文化对贵州文化的冲击及其与贵州文化的交流融合,造成了贵州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某些政治、经济、社会领域违反常态的超前性、不稳定性和复杂

^① 参考《学者笔下的贵州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性。有些外来文化,通过贵州文化的吸纳、消化甚至创造,再反射或者输出,形成了文化的正常交流。此种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火花,曾从不同的侧面光耀过中国社会,并成为近现代中华文化形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诚如前面所述,由于贵州地处西南,距离黄河、长江文化的发源地都较远,加之贵州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氐羌、百越、苗瑶和濮僚四大族系交会的结合点,同时又是汉族移民较多的地区,使得贵州各民族长期恪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在与山外的中原文化交流和西方文化的对撞以及众多移民的不同文化习俗杂处中难以形成统一的文化形态。在很长一段时间,谓之主流的汉文化与贵州非主流本土文化各行其道,使得本土文化的弱势与近现代强势的外来文化难以达到真正的交融。但正因如此,今天的贵州才保存了许多自己独特的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及文化思想。至今,在贵州民族文化形式中,仍保留有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有图腾崇拜、佛道巫术、祭祀乐舞的宗教遗留,有创世神话、谣谚传说一直到各类迁徙、叙事、自叙的民间歌舞艺术得以流传的心态环境;也有从远古岩画、古黔青铜器、寺庙雕刻、蜡染刺绣、鸡卜星历、地戏、阳戏、傩戏、花灯一直到民族服饰、民族曲艺、民族图案及工艺品得以存在的精神氛围……表现出贵州这片土地上特有的自然形态和文化形成,显示了复杂历史时期形成的多元民族文化,形成了它的多样化格局和灿若云锦般的辉煌。因此,对贵州历史即对贵州多元化民族思想的形成、传承以及在近现代历史中的演变和表现形态的梳理性研究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

通过这样的作业,我们试图了解和接近贵州民族文化思想的内核。经过研究,我们发现,贵州民族文化思想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内核的支离破碎,各种文化成分经过时间的整合而彼此相安,在近现代历史上逐步形成一个独具特色个性又相对完整和谐的统一体。也就是说,自1413年贵州建省以来,在漫漫的历史中那些不断增加的、动态的、更新的、分散的精神元素积淀形成了内涵深厚的地域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形成了贵州特有的文化传承。这种文化传承的主体就是贵州各民族及不同时期移民贵州的人们在长期实践的生存智慧和发展经验中形成的包容、思变等共同的积极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一旦成熟,必然对贵州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凝聚成一种贵州精神,从而激发贵州人民的归属意识、进取意识和奋斗意识,继而推动贵州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正是本课题研究的意义所在。

第二章 古老悠远的民族历史

贵州民族,主要由“百濮”、“氐羌”、“南蛮”、“百越”及“华夏”等五大族系构成。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百濮、氐羌、南蛮、百越、华夏五大族系不断发生变动,濮人渐次衰落,氐羌东进,苗瑶西移,百越由南向北推进,而华夏汉民由北向南进入贵州,以及蒙古、回、满等民族于不同时期、不同方向涌向地广人稀的贵州高原山区,相互对流,相互穿插,从而使贵州成为“古代民族交汇的大走廊和集结地”^①,逐渐形成“又杂居,又聚居”的分布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分化过程加剧,分别形成了贵州今天的各民族。

第一节 百濮族系

濮人是商周时期属于“南蛮”系统的土著民族,为周武王牧野誓师所举“西土”八族^②之一。在武王克商以后,在巴、楚、邓国之间,濮人曾经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巴、濮、楚、邓,吾南土也”^③。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濮人建立的濮国应在巴、楚之间的江汉平原地区,后被楚国所灭。由于早期濮人与巴人受楚攻逼,故从周代到春秋战国,濮人大批向西南迁徙。其中一支向湖南沅水、酉水一带流动,后逐步遍及湘西、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等地区。考古材料证实,贵州乌江流域黔东北境内有大量战国时期的悬棺遗迹,这说明濮人最迟在战国时期就已在黔东北地区活动了。濮族因其分布辽阔,人口众多,且长期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故有“百濮”之称。生活在今贵州的仡佬、侗等族与百濮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①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 “八族”,即庸、蜀、羌、髳、微、卢、彭、濮。

③ 《左传·昭公九年》。

一、仡佬族

仡佬族是贵州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自称为贵州的本地人,主要聚居于务川、道真、石阡等地,其余散居在黔西北、黔西南和黔北各地。

尽管仡佬族的称谓在宋代^①才开始大量出现于史籍,但其民族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其先民濮人很早就 在贵州中部建立了具有较高文明的夜郎文化。当周围的部落尚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状态时,夜郎境内的濮人就已“椎结、耕田、有邑聚”^②,即已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出现了村落和集镇,有了君长,其社会已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初期。3000 多年前,当周武王伐纣推翻商王朝统治后,于成周大会诸侯及“四夷”时,濮人就曾以特产丹砂前往朝贺。春秋战国时,广西境内的部分越人,溯水北上西进,移入西南地区,与濮人杂错而居,人口渐繁。^③ 其生活习俗相互影响渗透,其互为通婚的部分逐渐发展成为“僚”的族群。秦汉时,贵州高原出现了以濮人、僚人为主建立的夜郎、且兰、毋敛、牂、句町、漏卧等地方政权。公元前 130 年,汉朝以夜郎地设置犍为郡,前 111 年又分设郡。从此,这一带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逐渐密切。汉族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影响了濮人、僚人社会,从而缓慢地向封建社会过渡。7 世纪时,唐朝在今贵州省北部僚人居住地区,建立了羁縻州、县。这时,濮人、僚人社会的生产力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这一时期,史书中开始出现“葛僚”、“仡僚”、“革老”等名称,统称为“僚”。僚人可能是古代对这一地区若干少数民族的泛称。

民谣道:“蛮夷仡佬,开荒辟草”,从一定侧面反映了仡佬族先民在贵州及其附近广大地区最早开荒辟地、繁衍生息的史实。

二、布依族

布依族是贵州古老的土著居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布依族先民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石钺文化和青铜文化。

布依族与秦汉以前的“夷越”、“夷濮”、“夷僚”有着渊源关系。《华阳国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④“南中”即今之贵州、云南、四川南部,这一地区在周代以前就住着越人。《华阳国志》对“夷越”同时称之为“夷濮”。《后汉书》则称之为“夷僚”。可见,“夷越”、“夷濮”、“夷僚”都是古代布依族先民的不同称谓。《史记》、《汉

① “仡佬”一名最早见于南宋朱辅写的《溪蛮丛笑》。到了明代,“仡佬”一名被基本确定了下来。

② 《史记·西南夷列传》。

③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93 页。

④ 《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 1984 年版,第 24 页。

书》都把他们记载为古代“南中”地区的牂牁、夜郎国的主体。水稻种植是古夜郎国的主要经济特点,也是古越人的重要标志。至今,布依族仍有“水稻民族”之称。

布依族主要聚居在贵州黔南、黔西南以及散居于安顺、铜仁、遵义、毕节、六盘水和贵阳等地。

在族源上,贵州布依族又与岭南(广西)壮族有着同源的关系。秦王朝时期,为了加强统治,秦始皇曾用五十万大兵分五路进攻岭南一带,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且从中原迁来大批汉人“与越杂处”,以同化越人。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岭南的不少越民只好往地处深山河谷地带的牂牁、夜郎地区转移。加上当地原有越族居民,使得夜郎的越人人口大量增加,但仍与岭南越人聚居区连成一片。《都匀南齐以上地理考》载:“乌江以南,都匀、兴义、安顺诸府及贵阳、镇远、石阡诸府,平越之半皆为越地。”

布依族,魏晋南北朝时称“僚”,隋唐时期称“西南蛮”,宋元以后称“蕃”、“仲家蛮”,明、清称“仲蛮”,1953年,根据本民族的共同自称,统一用“布依”作为民族名称。

三、仡佬族

仡佬族是贵州古老的世居民族之一,他们自称“嘎窝”(麻江方言区)或“类窝”(凯里方言区)。壮族称之为“布谨”,汉族称之为“姆佬”。“仡佬”一词在民族语言中,就是“母亲”的意思。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仡佬族。

仡佬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是由古僚族群中逐渐发展而来的。晋人常璩《华阳公志·南中志》中,即有关于“僚人”在云贵高原云岭山脉南沿一带活动的记载。隋唐时,《岭外代答》、《溪蛮丛笑》等史籍中出现了“僚”、“伶”人共同体的记述。在宋代,仡佬族从僚、伶中分化出来形成了单一民族。至清代,在《天河县志》、《大清一统志》等汉文历史文献中,贵州、广西两省(区)仡佬族多以“木倮”、“木楼”、“木僚”、“木老”、“木佬”或“姆佬”等称谓见载。由此可见,仡佬与僚、伶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根据明嘉靖《贵州通志》、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康熙《定番州志》、《黔书》、《黔记》、《黔南职方纪略》、《黔南识略》、民国《贵州通志》等史籍记载和地名遗存情况,至少在元末明初时期,仡佬族已在贵州东至石阡、玉屏,西至平塘、平坝、贵定,南至独山、三都,北至余庆、瓮安等地居住和活动。至今,许多地方的寨、田、塘、山、林、坟、坡、坪仍遗有“木佬”之名。如瓮安的“木佬坪”乡,贵定的“木佬寨”村,玉屏的“木佬田”村,都匀的“木佬寨”村等。由于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的变迁,部分仡佬族或迁徙他地或改报为其他民族成分。

1952年,广西“木佬”被认定为“仡佬族”。20世纪80年代后,根据调查论证,贵州的“木佬”与广西的仡佬族族源相同,史载称谓一致,心理素质、风俗习惯、文化